

编者按：“硬权力”(hard power)，顾名思义，指武力及强制性力量。“软权力”(soft power)，则包括文化、凝聚力等其他各种力量。曾经，居天下之中的中国，将农耕文明之精髓发挥到极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城下之盟不请自来，老大帝国仓皇四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话语(汉语热)飘洋过海；中国概念急剧飙升。在外界话语迷阵此起彼伏之际，中国软权力何在？我们究竟如何管理中国崛起的进程？为此，本刊特发表《近代中国“软权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和《理解中国“软权力”的三个维度》二文，以飨读者。

## 近代中国“软权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

席会东 郑金标

郑金标(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以下简称“郑”)：“软权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于20世纪90年代初明确提出。一般认为，国家“软权力”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权力”而言的。国家“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国家“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向心力。一个国家的硬权力和软权力同等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只有在“软权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在软硬两种实力中，“硬权力”是基础，是创造“软权力”的重要物质条件；“软权力”能增加一个国家

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有助于通过文化或是制度上的吸引力增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

席会东(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以下简称“席”)：其实“软权力”理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不断成长壮大，国际间的非国家政治组织如联合国、超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欧盟等，以及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格局走向缓和解体，这些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都是这一理论提出的现实基础。

郑：确实如此。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正是在苏联解体的前夕，美苏之间的对抗正在以苏联被美国“和平演变”而走向终结。奈基于此而认为，“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权力”，而

“硬权力”是一种“对抗型权力”，“软合作权力”(soft cooperative power)和“硬强制权力”(hard command power)并存，两种权力同样重要。

席：“软权力”理论的提出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标志着以“硬权力”为核心的权力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时代的背景之下，“软权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表现和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奈以及众多国际关系学者那里，“软权力”更多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利体现。它至少忽略了两点，一是“软权力”和“硬实力”的界限并非时刻清晰；二是“软权力”并不仅仅是一个国际关系概念，它应该也涵盖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等更为丰富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软权力”理论应该还是一个有待充实和发展的理论。因此，我想我们的讨论应该在更多的历史事实层面上展开，从中国近代以来的“软权力”变迁的历史进程，来验证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及解释力。

郑：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传统中国的“软权力”状况。可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软权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处于强势地位。

席：确实如此，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

体制”的长期存在。“儒家文化圈”或者叫“汉字文化圈”“中华文化圈”是指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以汉字为主要文化载体、以中国制度为主要政治形态的国家和社会，而“儒家文化圈”的范围最起码可以涵盖中国、朝鲜（包括今天的韩国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和社会。朝鲜和越南早在汉代就已经纳入到了这一文化圈中，而日本在唐代也纳入到了这一体系之中。至于“朝贡体制”，也可以叫做“宗藩体制”或“册封体制”，它是指以中国为核心和宗主、以朝贡和册封为主要形式、以政治和经贸交往为实质的一种国际体系。“朝贡体制”的覆盖范围要超越东亚“儒家文化圈”，在明清时代的稳定范围包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国家和民族。

需要突出强调的是，尽管其中有过军事征服和武力对抗，但是“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的，这一点以日本融入的过程最为典型。在明清时代比较成熟的“儒家文化圈”或“朝贡体制”之下，中国虽然是象征性的“宗主国”，但更多的则是这一体系和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并不轻易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而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都因为在这一体系中获益或获利而主动融入这一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之中的。因此，这两种体系之中更多地包含有“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

同体”的意味。中国无疑在这两种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我想这应该就是所谓中国“软实力”的最好体现方式。

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看待历史上的国家关系,认为“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秩序,其中充斥着中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秩序能够持续千年,正说明了其生命力。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历史的合理性。

席: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导致了中国“软实力”的急剧衰落,这突出地体现在“儒家文化圈”的解体和“朝贡体制”的崩溃。这一过程的演进,并非以中国自身的衰落或亚洲国家力量对比的改变所导致,而是由西方另外一种政治军事和文化体系的侵入而造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和以文明自居的中国人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大变局,这种变局是和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改朝换代”和少数民族进据中原完全不同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正在为一种从未见闻过的东西所震撼。中国本身面临的困境和危机直接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崩溃。

其实,这一过程始于鸦片战争之前。原属“朝贡体制”之中的东南亚的诸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沦为葡萄牙、西班牙

和荷兰的殖民地,而“儒家文化圈”中主要成员越南在1859年之后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日本则在危机之后经过“明治维新”而全面转向西方模式,逐渐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走上和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原“汉字文化圈”的邻国朝鲜和中国的道路。而朝鲜则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逐步吞并,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独立的中国当然也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属国”,虽然试图通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来保护越南和朝鲜,但最终还是无法维护持续千年的“宗藩体制”。

郑:“宗藩体制”的崩溃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完成的,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在内都被动地纳入到了西方列强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当中。但“儒家文化圈”的解体则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实直到今天这些国家都还或多或少存在着“儒家文化”的遗风。这一方面说明那个时代中国“软实力”的衰落,另一方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软实力”的强大。

席:是的。以前有很多人想不通中国清政府为什么要因为越南和朝鲜而与法国和日本打仗,其实这里绝不仅仅是“天朝上国”的思想在作祟或出于所谓的“国际道义”,而是清政府在维护持续千年的政治文化秩序,是在维护一个现实存在的“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当时的中国以及越南、朝鲜都认为

这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圈”的解体和“朝贡体制”的瓦解也就是“天朝的崩溃”。

其实,中国“软权力”的衰弱更多地还表现在中国内部的变化。虽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坚信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的优越性,但是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要“师夷长技以自强”,并进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社会和政治体制领域内的变革,向西方学习。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开始自省,并反思自身文化和制度的缺陷,而这也正说明了中国“软权力”的衰落。

郑:其实中国和亚洲在那个时代的衰落是全方位的,而且是一种相对于西方的衰落。这种衰落表现在经济、军事等“硬权力”上,也表现在“软权力”上,而且在“软权力”的表现也还更为深刻和长远。

席:是呀,中国从丧失在亚洲的“话语权”到丧失“文化自信”,从“文化自傲”到“文化自省”再到“文化自卑”,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从清末以来,虽然不少政治文化精英仍然固守中国的制度和传统文化,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则开始着眼于向西方学习。在清政府自身的改革失败之后,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就意味着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进行根本性的、颠覆性

的重构,这一“话语”的背后潜藏的就是中国文化和制度的落后。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已“革命”而非以“传统”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工具,而这一“话语”实践的结果就是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的建立。所谓“民国”,也就是“人民共和国”,这一概念背后蕴含的完全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念。

郑:这种趋势在五四运动以后表现的,中国社会文化精英都开始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批判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以西方“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的”“落后的”的对象来对待的。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话语两极对立的背景下,文化精英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软权力”的衰弱与式微。

席:20世纪以后,尽管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仍在实质上起着作用,但是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已经都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自己标榜的口号。虽然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大多是来自西方的不同思想而已,而且也是以西方价值观念为衡量标准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是对西方社会一种批判,但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也是产生在西方的一种思想政治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则随着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一代人的老去而日渐式微,成为社会历史的潜流。

郑: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政体中,存在着软硬两种“权力”不相符合和不相协调的情况,需要具体看待和分析。一种是“硬权力”强大、“软实力”疲弱甚至是完全缺乏的国家,比如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联。纳粹德国一度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超群的国家,但由于其军事侵略扩张、鼓吹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的暴行成为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公敌,当然谈不上有任何“软实力”。苏联在二战后跃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并且以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自居,成为两大集团中共产主义集团的龙头老大。苏联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堪称强大,“硬权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政治上极权主义的克格勃(KGB)统治模式、经济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使得苏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上毫无吸引力可言,而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感的模式。即使在苏联强行控制的卫星国东欧诸国中反抗苏联的统治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苏联是一个不平衡的“瘸腿强国”,一方面“硬权力”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软实力”却严重缺乏。

第二类是“硬权力”比较薄弱而“软

权力”上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在今天属于“硬权力”寻常的国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位居世界第七,但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没有显著的影响力;希腊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后进国家,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就是人均GDP也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然而,没有人今天会否认,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和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形塑着西方国家,可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今天希腊和意大利依然有着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两国不属于世界强国,但两国的文明成功地转化成西方现代文明,成为“软实力”较为突出的国家。印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类到这一类型的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影响着南亚诸国(尽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斯里兰卡主体民族信仰佛教,尼泊尔的宗教信仰纷繁复杂,但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印度文化影响的痕迹),从印度发源的佛教则影响了世界各地近三亿的佛教信徒,并涵盖了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但今天印度的“硬权力”则依然有限,总体国力还不具有世界强国的实力,“软实力”较强、“硬权力”较弱是印度的特点。

第三类国家是“硬权力”和“软实力”都比较强大的国家,当前只有欧盟

和美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考虑到欧盟是新兴的超国家体,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只有美国够资格被称为同时具有强大“硬权力”和强大“软权力”的国家。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拥有庞大的经济产出,强大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在“软权力”领域,其法律制度、政体以及移民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电影和音乐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式英语则通行全球,成为国际领域交流的“世界语”,世界目前尚无任何语言可以取代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尽管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受损,但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本身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仍然把移民美国看成是首选,很多人谈到移民美国的原因时常常说:“美国比较自由。”“美国社会很开放,不排外。”“美国机会很多。”“美国很民主,而却是个人人遵守法律的国家。”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全面和正确,但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软权力”上所具有的吸引力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益处,会让国际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国,反过来增强该国的科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其“硬权力”。提高“软权力”,应该是崛起中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它应该随着中国“硬权力”的增长也同时提

高,帮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影响力。

席:如此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想要真正富强,必须要加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种力量。只有两者的平衡发展,才能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并保持国力长盛不衰。单纯依赖“硬权力”的国家往往不能够长期维持国力,这应该是一种历史经验。而且,“软权力”是需要着力建设的,它不会随着“硬权力”的增强而自然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等“硬权力”的提升,中国的“软权力”建设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世界开始重新定位并面对中国,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汉语热”,而中国政府也在世界推广“孔子学院”,传播自身文化。而在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学热”和“经学热”,国学院和读经运动在中国高校和民间社会中逐渐风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而“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印象依然还阴魂不散。

席:今天的中国就像一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中国生产力的奇迹使西方几乎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但是留给中国的增值空间在哪里?所以中国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在西方传播要改变的成见有两个:一是对中国过去形成的固有思维;二是对中国有畏惧感。中国现在最需要避免的一种国际形象就是威

胁,当其他国家表示担心时就自然会感到被冒犯,中国的良好愿望被拒绝,而且其意图被误解。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系统管理和分析其全球形象建立和自我描述的国家。例如为记者们提供关于中国的正面素材,允许他们访问中国的部长,并对这些部长进行游说方法的培训;与其他国家保持最成熟的全球公关关系。仔细分析和调查所有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并研究如何加以改变;巧妙地把对世界舆论有重大影响的人士和社会骨干作为自己开展工作的对象等等。如果我们这样去努力,可以在不大的支出情况下产生差别巨大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是提升我国“软权力”的重要资源。历史上,中国从不向周边国家输出武力,而是依靠先进文化的感召力来同化一个又一个邻邦。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强调和谐共存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中国政治文明一贯主张以德服人、以和为贵,与西方靠实力说话、以强凌弱的思维模式有很大区别,更易于为世界各国认同。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承认差异,坚持多样性,这种思想也更易获得他国认同。这些丰厚的文明遗产为中国构建“软权力”提供了优越条件。

席:需要反思的是,作为原“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都在充分发掘利用中国文化和传统资源,韩剧和日本动漫

都成为两国文化影响世界的象征与标志。甚至一些源自中国的文化遗产却被韩国人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如何主动掌握东亚文化的诠释权和话语权将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理论可以说是充分发掘文化传统资源并借以提升中国的“软权力”。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从“构建和谐社会”到“构建和谐世界”,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到“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国政府所倡导之价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和认同并逐渐形成“北京共识”。这一共识与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中国如何对待这些“普世价值”,如何赢得西方国家认同与赞赏都是中国政府要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也在越来越多的直接面对具体中国人而不是抽象中国。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公民”,如何塑造自身的文化形象,都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当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我认为,只有政府和民众两方面都真正意识到“软权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实践中切实践行,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并在综合实力全面提升的基础上,实现一个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中国世纪”。<sup>[4]</sup>